

养育子女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 母职惩罚和父职奖赏？

王 鹏 吴愈晓

摘要：养育子女对人们的社会网络资源具有影响且存在性别差异。通过使用 JSNET2014 数据发现：第一，养育孩子会改变父母日常社会网络资源的质量，对于女性而言，未成年子女越多，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但是餐饮社交活动越少；对于男性而言，未成年子女越多，其社会网络资源的异质性越强。第二，养育子女会影响父母在职业领域的社会网络资源，对父母的影响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相似的是，养育 3 岁以下的子女对父母的职业网络资源均有负面影响，既会减少父亲与同事、客户的网络资源，也会减少母亲与同事的交往；不同的是，养育 3 岁以上的子女对父亲的三类职场网络资源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母亲与同事、领导和客户的网络资源均有显著负向效应。第三，对于学龄期父母来说，养育孩子使得母亲的社会交往转向了“以孩子为中心”，母亲与孩子老师、其他家长的交往要明显多于父亲。

关键词：养育子女；社会网络资源；性别差异；母职惩罚；父职奖赏

DOI：10.19836/j.cnki.37-1100/c.2022.03.008

一、前言

近来许多研究发现，成为母亲和养育子女会让女性在职业领域遭遇收入惩罚。社会网络是获得信息、物质和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在这一途径中获得的资源会影响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地位。这是因为，社会网络的建立、维护和扩展需要时间、精力、金钱的投入。而养育子女也同样需要大量投入，那么这个过程是否会让女性在社会网络资源方面遭受“母职惩罚”呢？

已有关于“母职惩罚”的研究多数集中在描述母职对女性的教育、收入和晋升等方面的负面影响，但是其中的机制是什么，仍然比较模糊。关于为什么“成为父母”主要对女性的职业有负面影响，而对男性的影响却微乎其微，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成为母亲会让女性减少在工作经验上的积累和人力资源上的投资，降低在工作中的热情、投入和工作效率^①，或主动选择时间灵活但收入较低的工作^{②③}；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职业场所存在雇主的“统计歧视”，他们雇佣母亲时会提供更低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家庭结构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研究”(17YJC840038)；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农村留守儿童的发展问题研究”(16CQJ05)；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产阶级生活状况和社会态度研究”(19ASH007)。

作者简介：王鹏，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济南 250100；wangpeng@sdu.edu.cn)；吴愈晓，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23；yxwu2013@nju.edu.cn)。

① Becker G. S., “Human Capital, Effort, 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5, 3(1), pp.33-58.

② Polachek S., “Occupational Self-Selection: A Human Capital Approach to Sex Differences i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1, 58, pp.60-69.

③ England P., *Comparable Worth: Theories and Evidence*.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1992.

的工资或更少的晋升机会^{①②}。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考虑到养育子女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以及社会网络资源对女性职业收入的作用。关于社会网络资源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目前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社会网络及其所附带的信息、声望、权力等,能够显著影响行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结果^{③④⑤}。也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是导致劳动力市场男女两性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微观机制^{⑥⑦}。由此可以认为,社会网络资源也是女性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资源之一,有必要将其纳入“母职惩罚”的分析框架中。

在相关主流研究中,社会网络资源多数被当作自变量来研究其对个体职业地位和收入的效应^{⑧⑨⑩⑪};在少数将社会网络资源作为因变量的研究中,主要关注个人阶层地位和职业交往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⑫,养育子女的因素很少被关注。然而,养育子女是影响人们社会网络资源的特殊因素,因为建立和维护社会网络关系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而养育子女同样如此。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养育子女的阶段会让人们脱离原有的社会网络关系,起到消耗的作用。另外,社会通常将养育子女定义为“女性的活动”,这就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在养育子女的阶段中会体验到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角色认同,“父母”这一身份对女性比对男性的影响可能更加显著。那么,养育子女对男女两性的社会网络资源是否有不同的影响?

另外,目前对于社会网络资源的测量主要是从整体的角度关注社会网络的规模、差异性、顶端的网络资源和餐饮社交等方面^{⑬⑭⑮}。从总体上而言,这样测量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存在的问题在于,无法对职业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交往进行区别。本文认为,划分职业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社会网络资源是有意义的,这样可以直接测量“职场社会网络资源投入”的性别差异,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劳动力市场性别收入不平等的机制。另外,在探究养育子女如何影响社会网络资源的问题上,“以孩子为中心”的网络往往是被忽略的,但这可能是理解男女两性在社会网络资源差异上的一个重要窗口。因此本文把社会网络资源划分为日常的资源、职场的资源和“以孩子为中心”的资源,从这三个方面探讨养育子女对于父母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

考虑到上述几个方面,笔者认为应深入细致地研究养育子女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网络资源,这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因此,本研究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养育孩子是否会影响个人的社会网络资源?更具体地说,养育孩子是否会影响日常的社会网络资源、职业网络资源和“以孩子为中心”的社会资源?第二,养育孩子对社会网络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第三,养育子女是否通过社会网络的机制与性别不平等联系在一起?

① Phelps E. S., "The Statistical Theory of Racism and Sexis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2, 62, pp.659-661.
 ② Arrow K. J., "Models of Job Discrimination," in A. H. Pascal (Eds.),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Economic Life*, Lexington, MA: D. C. Heath, 1972, pp.83-102.
 ③ 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④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⑤ 梁玉成:《社会资本和社会网无用吗?》,《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⑥ 陈煜婷、张文宏:《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2009JSNet全国数据》,《社会》2015年第6期。
 ⑦ 程诚、王奕轩、边燕杰:《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异:一个社会资本的解释》,《人口研究》2015年第2期。
 ⑧ Granovetter M.,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⑨ Lin N.,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 PV Marsden, 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Sage, 1982, pp.131-145.
 ⑩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⑪ 张顺、程诚:《市场化改革与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效应》,《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1期。
 ⑫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⑬ 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第2期。
 ⑭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⑮ 边燕杰:《中国城市中的关系资本与饮食社交》,刘翠霞、林聚任译,《开放时代》2004年第2期。

二、养育子女如何影响父母的社会网络资源:社会性别的视角

关于养育子女如何影响父母的社会网络资源,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养育孩子扩大了父母的社会交往。比如为了增加社会支持,养育孩子的人会增加与亲朋好友的联系^{①②};有孩子的人与邻居的交往会更多,与孩子同学的父母交往也会更多^{③④};养育孩子的人会增加与儿童服务有关的其他人员的交往^⑤。第二种观点认为养育孩子限制了父母的社会交往。养育子女消耗了父母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从而限制了父母在工具性社会交往方面的投资^⑥;另外,养育子女使得父母的交往多为亲朋好友,减少了弱关系的交往,这导致了社会网络质量的下降^⑦。

然而,以上观点忽略了影响社会网络资源的性别因素,并且养育子女的过程可能会扩大这种性别分化。接下来,本文将借鉴家庭内部专业化理论(the model of within-household specialization)来论述这一点。根据家庭内部专业化理论,即基于男女两性各自的比较优势,丈夫专注于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妻子专注于家庭内部的事务,有利于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⑧。由于这样的家庭性别分工,养育子女对父亲和母亲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

(一)社会网络资源的性别差异

社会网络的性别不平等研究发现,父权文化在无形中束缚着女性的交往空间。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存在明显的性别分化现象,即女性的网络规模、网络顶端资源和网络异质性都不如男性^{⑨⑩}。也有研究认为,男性和女性的网络规模相似^⑪,但是网络的构成有很大差异。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网络中亲属比例更大,而男性的网络中同事比例更大^{⑫⑬}。一项针对中国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研究也发现,以家庭成员为主的亲缘关系在她们的社会网络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⑭。两性在获取和使用社

-
- ① Gottlieb B.H., Pancer S.M.,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in Michaels G.Y., Goldberg W.A. (Eds.),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Current Theory and Resear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8, pp. 235-269.
- ② Bost K.K., Cox M.J., Burchinal M.R., etc., "Structural and Supportive Changes in Couples' Family and Friendship Networks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2, 64, pp.517-531.
- ③ Moore G.,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Men's and Women's Personal Networ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0, 55, pp.726-735.
- ④ Nomaguchi K.M., Milkie M.A., "Costs and Rewards of Children: The Effects of Becoming a Parent on Adults' liv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2003, 65, pp.356-374.
- ⑤ Ambert A.M., *The Effect of Children on Parents*, 2nd ed. The Haworth Press, New York, NY, 2001.
- ⑥ Sayer L.C., Bianchi S.M., Robinson J.P., "Are Parents Investing Less in Children? Trends in Mothers' and Fathers' Time with Childre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4, 110 (1), pp.1-43.
- ⑦ Gallagher S. K., Gerstel N., "Connections and Constraints: The Effects of Children on Caregiv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2001, 63, pp.265-275.
- ⑧ Becker G., "Human Capital, Effort, 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5, 3(1), pp.33-58.
- ⑨ Lin N., "Inequality in Social Capital",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000, 29(6), pp.785-795.
- ⑩ 程诚、王奕轩、边燕杰:《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异:一个社会资本的解释》,《人口研究》2015年第2期。
- ⑪ Marsden P.V., Hurlbert J.S., "Social Resources and Mobility Outcomes: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Social Forces*, 1988, 66 (4), pp.1038-1059.
- ⑫ Fischer C. S., Olicker S.J., "A Research Note on Friendship, Gender, and the Life Cycle", *Social Forces*, 1983, 62, pp.124-133.
- ⑬ Wellman B., "Domestic Work, Paid Work and Net Work, in Duck, S., Perlman, D. (Eds.), *Understand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Sage: London, 1985, pp.159-191.
- ⑭ 张文宏、杨辉英:《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会资本方面存有差异,女性常常处于“缺乏资本”和“缺乏回报”的双重困境^①,男性则比女性更多地获益于工具性的网络,比如在求职过程中,男性通过弱关系找到高地位关系人的可能性更大,而女性拥有的同质性较强的社会网络并不会对其职业流动产生积极的影响^②。

(二)养育子女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

劳动力市场中的“母职惩罚”和“父职奖赏”主要用家庭内部专业化理论来解释^{③④⑤⑥}。简单地讲,即由于家庭内部分工的专业化,母亲在劳动力市场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积累,以及投入时间和精力会更少,也倾向于选择更灵活轻松、有利于照顾孩子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母亲们比父亲们更有可能遭遇雇主的统计歧视。这造成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⑦⑧},也被称为“母职惩罚”。而由于一般父亲承担着养家糊口的责任,男性在成为父亲之后不仅比女性,而且相比没有子女的男性要更努力,在职业上投入的人力资本和时间要更多^⑨,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为家庭争取更多更优质的生活来源,这一现象被称为“父职奖赏”。

根据该理论,养育子女对父母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相比父亲而言,母亲的顶端网络资源和多样性的网络资源缺乏。养育孩子使得女性在获取社会网络的信息流和物质流等资源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⑩,减少了建立更加广泛的异质性社会联系的机会^⑪。西方学者研究发现,婚姻和生育经常会限制女性形成亲属和邻居之外的关系,但是几乎不太可能影响父亲的网络^{⑫⑬⑭}。从中国情境来看,目前家庭性别分工的主流模式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内”,即男性主要活跃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则负责照顾家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高的,但是199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与男性劳动参与率的差距进一步扩大^⑮。二是由于劳动力市场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女性收入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在降低^⑯。三是家庭劳动和照料子女的工作主要由女性来承担。由于女性专注于家庭事务,容易造成与外部社会网络的相对隔离,减少建立异质性社会交往的机会;而且,由于母亲是养育子女的主要责任者,母亲们的日

① Lin N., “Inequality in Social Capital”,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000, 29(6), pp.785-795.

② 张文宏:《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研究——一种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5期。

③ Budig M. J., England P., “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1, 66(2), pp.204-225.

④ Noonan M., Corcoran M., “The Mommy Track and Partnership: Temporary Delay or Dead End?”,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04, 596(1), pp.130-150.

⑤ Glauber R., “Race and Gender in Families and at Work: The Fatherhood Wage Premium”, *Gender & Society*, 2008, 22(1), pp.8-30.

⑥ Killewald A., Gough M., “Does Specialization Explain Marriage Penalties and Premium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3, 78(3), pp.477-502.

⑦ England P., *Comparable Worth: Theories and Evidence*, Hawthorne, NY: Aldine de Gruyter, 1992.

⑧ Filer R., “Male-female Wage Differences: The Importance of 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1985, 38(3), pp.426-437.

⑨ Becker G. S.,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⑩ Munch M., Smith-Lovin, “Gender, Children, and Social Contact: The Effects of Childrearing for Men and Wom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4, 509-520.

⑪ Moore G.,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Men’s and Women’s Personal Networ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0, 55, pp.726-735.

⑫ Fischer C. S., Olicker S.J., “A Research Note on Friendship, Gender, and the Life Cycle”. *Social Forces*, 1983, 62, pp. 124-133.

⑬ Wellman B., “Domestic Work, Paid Work and Network”, in Duck S., Perlman D. (Eds.), *Understanding Personal Relationships*, Sage: London, UK, 1985, pp.159-191.

⑭ Campbell K.E., “Gender Differences in Job-Related Networks”, *Work and Occupations*, 1988, 15, pp.179-200.

⑮ 彭青青、李宏彬、施新政等:《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金融研究》2017年第6期。

⑯ 吴愈晓:《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与2002年比较》,《社会》2010年第6期。

常交往对象多为同样受到母职惩罚的人，或者为孩子提供服务和支持的人，比如亲戚、保姆、幼教等^①，因此她们的社交网络顶端的职业声望会比较低。另外，父亲和母亲在社会网络资源的投资和维系上会有不同。在中国，餐饮社交被认为是维持社会关系和积累工具性网络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家庭性别分工对父亲的期待是“养家糊口”，对母亲的期待是“养儿育女”，所以父亲参与请客吃饭会被视为理所当然，而母亲则会主动或被动地减少餐饮社交，把时间分配给家庭和子女。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1a：与无未成年子女的男性相比，养育未成年子女会增加父亲的日常社会网络资源。

假设 1b：与无未成年子女的女性相比，养育未成年子女会减少母亲的日常社会网络资源。

第二，体现在职业交往的网络上。男性相比女性就业率更高，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广泛的职业性别隔离^②。“女性化”的职业通常收入和职业声望较低，而男性基于职业的社会网络资源会更加丰富；其次，即便就业的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的劳动也普遍多于男性^③。虽然有研究表明，近年来父亲在育儿活动中的参与度大大增加，但是他们在育儿上的投入仍明显低于母亲^④，因此男性的职业网络资源不太容易受到家庭事务的负面影响。当照料孩子成为女性的主要任务时，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交往上的投资较少。养育子女大大增加了母亲们的家务劳动，耗费了母亲们的精力，尤其是当代中国越来越精细的育儿方式，使得养育子女的时间成本空前增加，母亲不仅要照顾年幼子女的生活，还要规划学龄子女的教育和课外培训^⑤。身处职场的母亲们，通常下班后要回家轮值“第二班”，没有时间参与领导同事客户的社交活动，维持或增加与职业领域有关的社会交往。一项对白领工作者的研究发现，养育年幼的孩子降低了女性与工作有关的社会交往^⑥。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2a：与无未成年子女的男性相比，养育未成年子女会增加父亲的职业网络资源。

假设 2b：与无未成年子女的女性相比，养育未成年子女会减少母亲的职业网络资源。

第三，体现在“以孩子为中心”的社交网络上。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网络构成中亲属占比较高，非亲属占比较少（除了邻居）。一种解释是从天性的角度，即女性天生倾向于维持在家庭和亲属内部的亲密关系^{⑦⑧⑨}；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父权文化鼓励母亲们聚焦于家庭^⑩。女性围绕孩子的照顾和教育展开社交网络，社会网络会更加受限。妈妈们在母婴论坛、微信妈妈群、教育论坛中聊的话题，都在固化和加深这种性别隔离，这种看似自然形成的过程，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有研究指出，女性围绕孩子建立的网络，有利于增加她们的社会支持，也有可能带来主观幸福感的红利^{⑪⑫}，但对她们的职业发

① Marsden P.V.,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7, 52, pp.122-131.

② 吴愈晓：《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③ 於嘉：《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社会》2014年第2期。

④ 许琪、王金水：《爸爸去哪儿？父亲育儿投入及其对中国青少年发展的影响》，《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1期。

⑤ 杨可：《母职的经纪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2期。

⑥ Campbell K.E., “Gender Differences in Job-related Networks”, *Work and Occupations*, 1988, 15, 179-200.

⑦ Miller W. B., “Sexual and Contraceptive Behavior in Young Unmarried Women”, *Primary Care* 3, 1976, pp.427-453.

⑧ Chodorow N., “Being and Doing: A 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 of Males and Females”, in V. Gornick and B. K. Moran (Eds.), *Women in Sexist Society: Studies in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p.259-291.

⑨ Gilligan C.,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⑩ Browne K. E., “Work Style and Network Management: Gendered Patterns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in Martinique”, *Gender and Society*, 2000, 14(3), pp. 435-456.

⑪ Aassve A., Goisis A., Sironi M., “Happiness and Childbearing across Europe”,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2011, 108(1), pp.65-86.

⑫ Baranowska A., Matysiak A., “Does Parenthood Increase Happiness? Evidence for Poland”,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011, 9, pp.307-325.

展却是不利的^①。

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3:母亲的“以孩子为中心”的社会网络资源高于父亲。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2014年“中国大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JSNET2014)的数据^②。该调查基于全国数据抽样框,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中国八大城市开展,总样本为5480人。调查内容既包括个人的职业经历,又涵盖了拜年网、餐饮网等多个社会网络资源和社会网方面的主题,与本文的研究内容非常契合。由于涉及职业经历,本文只保留了55岁以下的样本,经过严格的数据清理和筛选,最终的有效样本量为3348人。

因变量是社会网络资源,本文将其分为三类:一是日常社会网络资源,它主要与个人在日常生活 中的社会网络有关;二是职业社会网络资源,它是指与个人职业直接相关的社会网络;三是“以孩子为 中心”的社会网络,它是父母围绕子女的学习和生活所建立的网络。对三类因变量的测量将分别在本文的分析结果部分详细介绍。

数据分析的步骤如下:第一,估计影响居民日常社会网络资源的因素,目的在于检验养育子女如何影响人们日常的社会网络资源,以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第二,分析养育子女如何影响人们的职业社会网络,以及该影响在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中是否有差异;第三,分析养育子女如何影响“以孩子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以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四、分析结果

(一)养育子女如何影响父母的日常社会网络资源

本小节数据分析的因变量是“日常社会网络资源”。根据以往的研究,采用“定位法”来测量中国居民的关系网络更加适合^③。许多研究发现拜年网和餐饮网有很强的工具性色彩,嵌入其中的社会网络资源不仅对求职过程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对个人的权力、声望、收入等方面有明显的提升作用^{④⑤⑥⑦}。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本文用网络规模(拜年人数)、网络顶端(最高职业声望)、网络差异(职业个数)和网络维护(餐饮社交)来测量社会网络资源。前三者主要测量社会资源的存量: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网络中包含的信息和人情可能越多,本文对通信工具拜年人数和非通信工具拜年人数做因子分析,并将得出的公因子转化为0-100的数字;网络顶端越高,即网络内拥有高权力、高地位、高声望的关系人越多,本文使用职业声望得分来测量^⑧;网络差异即网络的多样性,差异越大,意味着网络内资源互补的职业种类越多,本文使用职业数目来测量。而餐饮社交则涉及社会网络的维护和运作策略,请客吃饭是中国比较独特且重要的社交形式。本文将餐饮社交的频率和通过餐饮社交结识新友的频率做因子分析,提取出一个因子,并将该因子转化为0-100的数字,该指标的含义是:数值越高,餐饮社交

① Stoloff J. A., Glanville J. L., Bienenstock E. J.,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Labor Force: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1999, 21(1), pp.91-108

② 注:2014年数据是目前可获得的JSNET最新基线数据。

③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④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⑤ 王卫东:《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本与个人资本》,《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⑥ 程诚、王奕轩、边燕杰:《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异:一个社会资本的解 释》,《人口研究》2015年第2期。

⑦ 边燕杰、郭小弦:《餐饮网社交功能的中日韩比较》,《学术交流》2015年第2期。

⑧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的频率越高,以及通过餐饮社交结识新友的频率越高,即通过餐饮社交运作获得资源的潜力越大。

由于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差异和网络维护四个变量均为连续变量,因此合理的估计方法应该是 OLS 模型。核心自变量是性别(男性=1)、未成年子女数(连续变量)和子女的年龄组(分为三组:0-2 岁子女、3 岁及以上学龄子女、无学前或学龄子女)。之所以划分子女的年龄组,是考虑到不同年龄的子女所对应的抚育责任有所不同,比如 0-2 岁的孩子需要更多日常生活的照料,3 岁及以上学龄儿童则需要父母在教育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和年龄平方、户口(非农户口=1)、受教育年限、家庭年收入、职业地位(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ISEI,连续变量)和是否在婚(是=1)。本小节的样本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日常社会网络资源与自变量描述统计表

变量	男性	女性
网络规模	1.88(2.30)	1.38(1.43)
网络顶端	71.84(28.59)	68.17(29.28)
网络差异	5.99(4.38)	4.87(3.70)
餐饮社交	42.60(20.59)	35.73(20.66)
年龄	36.71(10.20)	37.83(9.88)
户口(非农户口=1)	0.87	0.87
受教育年限	13.96(2.98)	13.61(3.02)
家庭总收入(单位:万元)	10.51(15.07)	9.69(8.57)
职业地位	45.55(14.32)	46.16(13.15)
婚姻状态(在婚=1)	0.61	0.68
未成年子女人数	0.36(0.52)	0.43(0.56)
子女年龄组		
0-2 岁子女	0.06	0.05
3 岁及以上学龄子女	0.28	0.35
无学前或学龄子女	0.66	0.60
样本数	1549	1799

注:括号内为连续变量的标准差。

表 1 分性别描述了所有被调查者在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差异和餐饮社交上的均值和标准差,以及在各个自变量上的分布情况。

表 2 养育子女对男性总体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男性样本)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网络规模	网络顶端	网络差异	餐饮社交
非农户口	-0.528**	-4.320*	-1.262***	-2.213
年龄	-0.093	-0.454	-0.145	-0.438
年龄平方	0.001	0.001	0.002	-0.001
受教育年限	0.109***	1.988***	0.269***	0.984***
家庭年收入	0.002	0.094*	0.015*	0.159***

续表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职业地位	0.004	0.258***	0.026**	0.066 ⁺
在婚	0.303 ⁺	6.375***	1.287***	-2.029
未成年子女数	0.555	1.222	1.882*	5.018
子女年龄 ^a				
0-2岁	-0.268	-3.050	-2.181*	-4.856
3岁及以上学龄子女	-0.191	0.898	-1.363	-4.195
常数项	1.931 ⁺	46.144***	4.019*	44.712***
样本数	1549	1549	1549	1549
决定系数	0.033	0.128	0.085	0.174

注:(1)所有标准误未显示;(2)参考项:a 无学前或学龄子女;双尾检验显著度:⁺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 。

表 2 的结果显示,控制了其他因素后,非农户口的男性在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和网络职业差异等资源上要低于农业户口的男性,且分别在 0.01、0.05 和 0.001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城市工作的农业户口男性更注重构建和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资源。年龄对男性的社会网络资源没有显著的影响。教育、家庭年收入、职业地位和已婚状态均对男性的社会网络资源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受教育年限越高,四类社会网络资源均越高,且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家庭年收入对网络顶端资源、网络差异和餐饮社交等方面的资源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分别在 0.05 和 0.001 的水平上显著。职业地位越高,网络顶端资源越多($p < 0.001$),网络职业差异越大($p < 0.01$),餐饮社交越频繁($p < 0.1$)。处在婚姻状态的人,相比不在婚姻状态的人,网络规模更大($p < 0.1$),网络顶端资源更多($p < 0.001$),网络职业差异也更大($p < 0.001$)。未成年子女数会增加男性多样化的社会网络资源($p < 0.05$),但是养育 0-2 岁的子女也会减少父亲社会网络资源的差异性,并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这部分证明了我们的研究假设 1a,即养育子女会增加父亲的日常网络资源。但是由于养育子女的责任越来越集中于家庭,尤其是对 0-2 岁孩子的照料越来越“科学”和“精细”,父亲在亲密育儿的活动参与逐渐增加,这可能会减少父亲在多样性网络关系中的时间投入,所以减少了父亲多样化的网络资源。

表 3 养育子女对女性总体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女性样本)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网络规模	网络顶端	网络差异	餐饮社交
非农户口	-0.299**	2.498	-0.334	1.597
年龄	-0.086*	-1.718*	-0.207*	-0.330
年龄平方	0.001*	0.021*	0.002*	-0.001
受教育年限	0.023	1.925***	0.152***	1.097***
家庭年收入	0.009*	0.340***	0.041***	0.455***
职业地位	0.011***	0.307***	0.022**	0.108**
在婚	0.397***	3.896*	0.984***	-1.529
未成年子女数	0.453*	2.822	0.339	-4.580 ⁺
子女年龄 ^a				

续表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网络规模	网络顶端	网络差异	餐饮社交
0-2 岁	-0.340	-10.779 [*]	-1.267 ⁺	0.442
3 岁及以上学龄子女	-0.320	-0.277	-0.070	2.740
常数项	2.128 ^{***}	51.843 ^{***}	5.115 ^{**}	26.567 ^{**}
样本数	1799	1799	1799	1799
决定系数	0.057	0.117	0.063	0.198

注：(1)所有标准误未显示；(2)参考项：a 无学前或学龄子女；(3)双尾检验显著度：⁺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 。

表 3 报告了养育子女对女性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结果发现，控制了其他因素后，非农户口女性的网络规模要小于农业户口的女性。年龄对女性的网络规模、网络顶端资源和网络职业差异的影响都呈现出 U 型的态势，并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受教育年限显著地增加了女性的网络顶端资源、网络职业差异和餐饮社交，且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家庭年收入和职业地位越高，女性的四类社会网络资源越多。婚姻也扩大了母亲们的网络规模和网络中的职业差异 ($p < 0.001$)，并且增加了网络顶端的资源 ($p < 0.05$)。模型 1 表明，未成年子女数越多，母亲的网络规模越大 ($p < 0.05$)。但是，模型 4 显示，未成年子女数越多，母亲们的餐饮社交活动越少 ($p < 0.1$)。另外，模型 3 的结果表明，养育 3 岁以下的子女不仅会减少母亲的网络顶端资源 ($p < 0.05$)，也会降低母亲社会网络资源的差异性 ($p < 0.1$)，即减少网络资源中的职业多样性。这部分证明了我们的研究假设 1b，即养育子女会降低母亲社会网络资源的平均职业声望、多样性和餐饮社交。由于未成年子女的增加对母亲网络规模的正向作用主要是体现在“以孩子为中心”的网络联系人增加，比如亲戚、邻居、保姆、孩子的老师以及孩子同学的父母等等，这虽有利于母亲的社会支持，但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看，并无益于职业地位的提升。

本小节的研究结果表明：养育子女对父母日常网络资源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未成年子女越多，父亲的社会网络资源异质性越强，但是养育 0-2 岁的子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父亲社会网络资源的差异性；未成年子女越多，母亲的网络规模越大，但是会显著减少母亲的餐饮社交，而且养育 0-2 岁的子女也会减少母亲网络顶端资源和职业差异性。

(二) 养育子女如何影响父母的职业社会网络资源及其性别差异

本小节检验养育子女如何影响父母的职业社会网络资源^①。因变量是职业社会网络资源，包括同事网络(将在工作场所与同事打交道的频率做因子分析，并将提取的因子转化为 0-100 的数字)、领导网络(将在工作场所与领导打交道的频率做因子分析，并将提取的因子转化为 0-100 的数字)、客户网络(将与顾客/服务对象/客户打交道的频率做因子分析，并将提取的因子转化为 0-100 的数字)。同事和领导网络反映了个体在职业活动场域中的“科层关联度”，客户网络体现了交往的“市场关联度”^②。科层内部的关联度越高，意味着从工作关系拓展朋友关系的潜力越大，尤其是与领导的交往，对个体职业地位的提升更加关键；市场关联度越高，意味从市场关系发展朋友网络的机会越大。它们均为连续变量，因此使用 OLS 模型进行估计。核心自变量是未成年子女数和子女的年龄组。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的年龄、户口、受教育年限、家庭年收入、职业地位(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ISEI，连续变量)和婚姻状态。

① 因篇幅有限，本文未显示该小节的样本描述统计表，感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王鹏联系：wangpeng@sdu.edu.cn。

②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

表 4 养育子女对父母职业网络资源的影响(分性别)

	男性			女性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同事网络	领导网络	客户网络	同事网络	领导网络	客户网络
非农户口	6.160*	1.814	2.981	5.749*	2.399	1.246
年龄	-3.577***	-1.475	-2.442*	-0.623	-0.781	0.070
年龄平方	0.043***	0.015	0.026 ⁺	0.008	0.004	-0.009
受教育年限	1.319***	0.895*	0.383	1.086**	1.116**	0.946*
家庭年收入	0.031	0.056	0.079	0.001	0.239*	0.029
职业地位	-0.059	0.129 ⁺	0.298***	0.172*	0.275***	0.257**
在婚	4.346 ⁺	1.977	1.494	2.787	6.273**	7.222**
未成年子女数	6.526	2.382	7.406	12.676	5.142	7.943
子女年龄组 ^a						
0-2岁	-16.900*	-11.071	-16.674 ⁺	-16.444**	-8.113	-10.692
3岁及以上学龄子女	-5.165	-2.445	-5.961	-19.502***	-11.335*	-12.852 ⁺
常数项	113.352***	70.977***	82.031***	53.359***	46.042**	38.192*
样本数	1219	1219	1219	1363	1363	1363
决定系数	0.036	0.032	0.040	0.039	0.069	0.055

注:(1)所有标准误未显示;(2)参考项:a 无学前或学龄子女;(3)双尾检验显著度:⁺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 。

表 4 分性别描述了目前被访者在同事网络资源、领导网络资源、客户网络资源的分布。结果表明,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而言,非农户口居民与同事网络的社会交往都要高于农业户口的居民($p < 0.05$)。年龄对男性的同事网络资源和客户网络资源的影响呈现出“U”型模式。受教育程度越高,男性与同事的社会交往越多($p < 0.001$),与领导的交往也越多($p < 0.05$)。受教育程度对女性与同事、领导和客户的交往也有显著的增强作用,并分别在 0.1 和 0.05 的水平上显著。年收入对男性的各类职业网络资源均无显著的影响,但对女性与和领导的交往有显著的促进作用($p < 0.05$)。男性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越高,其与领导的交往越多($p < 0.1$),与客户的交往也越多($p < 0.001$)。女性的职业地位对其与同事的网络资源、与领导的网络资源和与客户的网络资源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分别在 0.05、0.001 和 0.01 的水平上显著。已婚男性相比不在婚的男性与同事的交往更多($p < 0.1$)。在婚状态会对女性与领导的网络资源和客户网络资源有显著的提升作用($p < 0.01$)。未成年子女数对父亲和母亲的职业网络均无显著的影响。模型 1-3 显示,相比无学前或学龄儿童的人,养育 0-2 岁的子女会减少父亲与同事的交往($p < 0.05$),也会减少与客户的交往($p < 0.1$)。养育 3 岁以上的子女,对男性的各类职业网络资源没有显著的影响。研究假设 2a 没有得到证明。这说明,父亲对 3 岁以下婴幼儿的抚育活动也给他们的同事网络资源和客户网络资源造成了负面影响,不但没有带来“父职奖赏”,还产生了“父职惩罚”。模型 4 的结果显示,养育 0-2 岁的孩子,以及 3 岁以上的子女,对母亲的同事网络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分别在 0.01 和 0.001 的水平上显著,即养学前或学龄子女,会减少母亲在职场与同事的交往和与客户的交往;模型 5 的结果表明,有 3 岁以上的学龄子女,会减少母亲与领导的交往,并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模型 6 的结果表明,有 3 岁以上的学

龄子女，会减少母亲与客户网络的建立和维持($p < 0.1$)。这证明了研究假设 2b。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养育子女对父母职业网络资源的影响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相似的是，养育 3 岁以下的子女对父母的职业网络资源均有负面影响，既会减少父亲与同事、客户的网络资源，也会减少母亲与同事的交往；不同的是，养育 3 岁以上的子女对父亲的三类职场网络资源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母亲与同事的网络、领导的网络和客户的网络资源均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三)“以孩子为中心”的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

本小节检验“以孩子为中心”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①。因变量是被访者的“以孩子为中心”的社会网络资源，由于该调查收集的是被访者最大的孩子在上小学、初中、高中期间与老师和其他家长联系的频繁程度，本文分别将被访者在这三个阶段与老师、其他家长联系的频繁程度做因子分析，并将提取的三个因子分别转化为 0-100 的数字，取值越大意味着联系越频繁。它们均为连续变量，因此使用 OLS 模型进行估计。核心自变量是性别(男性=1)、未成年子女数(连续变量)、最大子女的性别(男性=1)。

表 5 “以孩子为中心”的社会网络的影响因素及其性别差异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小学阶段与老师、其他家长的联系	初中阶段与老师、其他家长的联系	高中阶段与老师、其他家长的联系
男性	-8.397***	-5.960**	-6.019*
非农户口	5.173 ⁺	1.506	2.337
受教育年限	1.697***	2.318***	1.844***
年收入	0.116	0.256 ⁺	0.334 ⁺
职业地位	-0.054	-0.022	0.079
在婚	1.652	0.417	-0.028
未成年子女数	3.357*	0.588	-2.440
子女性别(男=1)	1.065	-0.868	1.185
常数项	35.484***	25.324***	21.721**
样本数	1154	724	502
决定系数	0.072	0.093	0.082

注：(1)所有标准误未显示；(2)双尾检验显著度：⁺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 。

表 5 报告了回归模型的结果。模型的结果显示，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无论孩子是在小学、初中还是高中期间，母亲与孩子老师、其他同学父母的交往频率都显著高于父亲，并分别在 0.001、0.01 和 0.05 的水平上显著。非农户口的父母在子女小学阶段，与老师和其他同学家长的交往频率更高($p < 0.1$)。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基础教育的各个阶段均与老师和其他家长联系的频率越高，且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家长的年收入越高，在初中和高中期间与老师和其他家长的频率越高($p < 0.1$)。在小学期间，未成年子女数越多，父母与老师和其他家长联系的频率越高($p < 0.01$)。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母亲在“以孩子为中心”的社会网络资源上是高于父亲的，母亲在这方面的投入可能会增进亲子关系或有利于子女发展，但不会对母亲的职业发展有直接的作用。

^① 因篇幅有限，本文未显示该小节的样本描述统计表，感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王鹏联系，邮箱：wangpeng@sdu.edu.cn。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JSNET2014 的数据,研究了养育子女对人们社会网络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父亲和母亲的社会网络资源进一步分化了。

第一,养育孩子会改变父母总体社会网络的质量和构成,并且存在性别差异。具体来说,对于女性而言,未成年子女越多,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但是餐饮社交活动越少;对于男性而言,未成年子女的数量越多,父亲社会网络资源的异质性越强。相比无未成年子女的人来说,养育 0-2 岁的孩子,对父亲和母亲异质性的社会网络资源均有负面作用,而且养育 0-2 岁的孩子还会对母亲的网络顶端资源有消极影响。

第二,养育孩子会影响父母在职业领域的社会网络资源。研究发现,养育 0-2 岁的孩子,既会减少父亲与同事、客户的交往,也会减少母亲与同事的交往;养育 3 岁以上的孩子,既会减少母亲在职业场所中与领导、同事的交往,也会影响其客户网络的建立和维持,但是对父亲的职业网络资源没有显著影响。

第三,养育孩子使得母亲的社会交往转向了“以孩子为中心”的网络,对学龄期父母的研究发现,母亲与孩子老师、其他家长的交往要明显多于父亲。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养育子女使得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网络资源上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养育儿童,不仅会降低母亲日常网络资源的质量,也使得母亲在与职业有关的社会网络上退缩,将社会交往集中在“以孩子为中心”的网络上。养育 0-2 岁的婴幼儿,虽然也会对父亲网络资源的异质性和与同事客户的交往有微弱的负面影响,但是影响范围要比母亲更小,而且养育 3 岁以上的学龄子女,对其日常网络资源和职业网络资源均无显著的影响。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表明,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的工具性资源会有利于个体在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地位获得。因此从工具性网络资源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回报上说,男女两性在养育子女阶段所出现的社会网络资源分化,有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和来源。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回应劳动力市场的“母职惩罚”和“父职奖赏”,即越来越精细的养育方式使得母亲在养育子女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养育子女会通过减少母亲的社会网络资源,影响她们的职业地位获得。所以,“母职惩罚”是显而易见的,母亲承担了更为繁重的儿童养育压力,这也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和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因此倡导育儿投入的性别平等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由于“精细”育儿方式的盛行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家庭整体的育儿负担空前增加。与母亲相比,父亲不是育儿的主力,但是为孩子提供日常照顾的父职参与正逐渐增加。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养育 3 岁以下的子女也会降低父亲日常社会网络资源的异质性以及在职场中与同事、客户的交往,也就是说,父亲并不是育儿过程中纯粹的受益者,生儿育女对父亲的社会网络资源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职业发展。所以,养育子女并未带来纯粹的“父职奖赏”。国内也有学者发现,生育对男性的工资溢价效应在不断减小^①。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由“家庭内部专业化理论”所延伸解释的生育所带来的“母职惩罚”和“父职奖赏”只得到了部分的验证,“母职惩罚”仍然存在,“父职奖赏”逐渐消失,甚至养育低龄婴幼儿还会产生“父职惩罚”。由此可见,性别化的家庭内部分工不但没有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可能会为夫妻双方尤其是女性的职业发展造成障碍或留下隐忧。如果传统性别观念和性别分工继续盛行,“养儿育女”在劳动力市场上所带来的“惩罚”可能会越来越重。

然而,“生育惩罚”的加重,不仅是家庭内部性别分工不平等的结果,还与日益加重的养育责任有

^① 许琪:《从父职工资溢价到母职工资惩罚——生育对我国男女工资收入的影响及变动趋势研究》,《社会学研究》2021 年第 5 期。

关。近年来，育儿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一方面是由于公共抚育资源的相对缺失，另一方面则是密集养育的层层渗透。家庭对子女的养育责任，不仅体现在科学而精细的日常照料，而且突破了生活教育的传统内涵，延伸到学科教育以及各类教育培训体系中。本研究的结论认为，生育的“惩罚”正逐渐以家庭为单位，如果不关注加剧育儿压力的社会因素，把养育子女视为纯粹家庭内部的“私事”，继续从家庭支持系统寻求解决方案，会进一步推动养育责任在家庭内部的内卷，加重对整个家庭的惩罚。也有许多学者指出，在缺少制度性支持和公共政策的前提下，私人领域内育儿职责的分配，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养育责任给女性造成的压力，只能造成家庭内部资源的挤压^{①②}。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家庭内部专业化”理论又过于局限在个体选择和家庭策略上，缺乏对社会结构性因素的考量。

另外，从宏观角度而言，养育所带来的“惩罚”既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不平等，也不利于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提高。作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生育和养育责任的讨论应该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有关生育政策的转变，公共抚育资源和照料体系的设计，应该给予人们更多的社会支持以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进而走出个体选择的困境。

Raising Children and Parents'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Motherhood Penalty and Fatherhood Premium?

Wang Peng Wu Yuxiao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School of Soci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P.R.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ffect of raising non-adult children and its interaction effect with gender on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Using Data from a national sample (JSNET 2014) in China, we find evidence for the effects of parenthood on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The number of non-adult children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ize of social network for women and the diversity of social network of men. We find that raising children under 3 is both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iversity of social network for mothers and fathers. It is also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top occupation prestige of social network for mothers. There is evidence that raising non-adult childre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social network negatively for mothers in occupational area and we also find evidence for the negative effect of parenthood on the occupational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for fathers. There is evidence that mothers' social network is "child-centered" and they interact more than fathers with children's teachers and other parents.

Keywords: Raising children; Social network resources; Gender differences; Motherhood penalty; Fatherhood premium

[责任编辑:陆 影]

① 郭戈:《“丧偶式育儿”话语中的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② 施芸卿:《当妈为何越来越难——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母亲”》,《文化纵横》2018年第5期。